

# 宋神宗时期的八阵法与阵图

王路平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陕西 西安 710004)

**摘要:**北宋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辽和西夏的威胁,与辽和西夏的战争刺激了北宋对阵法的研究和创制。从太宗朝到神宗朝,对阵法的研究、讨论、演习、运用从未中断。特别是神宗锐意整军,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阵法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将从中御”传统家法的束缚,阵法建设并未使北宋的军事能力发生改观。

**关键词:**宋神宗;八阵法;阵图;辽;西夏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1-0105-06

北宋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辽和西夏的威胁,与辽和西夏的战争刺激了北宋对阵法的研究和创制。从太宗朝到神宗朝,对阵法的研究、讨论、演习、运用从未中断。北宋君臣对阵法的应用和对阵图的关注是以往各个朝代所不及的,然而对外作战却频频失利。有学者对北宋的阵法建设和阵图的危害进行过精辟论述<sup>[1-4]</sup>。本文以神宗朝的八阵法建设为考察对象,着重剖析阵法建设与北宋国防战略和祖宗家法的关系,试图就神宗一朝朝野上下对阵法、阵图极为重视,但在实际战争中收效甚微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 一、八阵法溯源

所谓阵法是指古代军事战争中,部队在战斗和宿营中按照一定的战术要求对部队队形进行的安排和部署。阵图则是将这种安排和部署用文字或者符号形式记录下来,并制定一整套作战方案。阵法是古代将领在长期的战争中经过实践总结,能够最大

限度发挥部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战术安排。它根据士兵的能力和装备情况,结合不同的地形要求,通过特定的指挥信号,指挥各兵种协同配合,达到单兵作战效能及军队整体战斗力最大化。阵法的使用效果与将帅的军事水平以及军队日常阵法操练密不可分。只有对士兵进行长期演练,使其熟悉自己在整个阵法中的位置、作用,才能保证在实战过程中,通过旗语、战鼓等简单的通信手段,就能够将命令高效、准确地传达到每个士兵,达到如臂使指的良好效果;也才能使将帅的军事指挥水平得到充分发挥,战略意图得到实现。有鉴于此,古代的军事将领都十分重视阵法及其演练,并创制了许多知名的阵法和阵图,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其中尤以八阵法为代表。

所谓的八阵之说始于孙武,但在今本《孙子兵法》中没有关于八阵的明确记载。《隋书·经籍志》著录《孙子八阵图一卷》<sup>[5]</sup>,但已经亡佚。战国时《孙臆兵法》中也有八阵的记载,并认为“阵则知八阵之经”,“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但对八阵的具体内容没有说明。《魏书》有“汉承秦

收稿日期:2014-01-07

基金项目: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L108)

作者简介:王路平(1980-),女,河南许昌人,馆员。

制,会五营士为八阵”,说明在西汉时八阵仍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阵法<sup>[6]</sup>。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勒以八阵”大破匈奴北单于。《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苏轼还曾专门赋诗赞之曰:“唯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隋书·经籍志》也著录《诸葛亮八阵图一卷》<sup>[5]</sup>。及至唐代,兵家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早已闻名的八阵法成为关注的焦点。独孤及的《风后八阵图记》,李荃的《太白阴经》、裴绪的《裴绪新令》都有对八阵法的阐述和解读,然而多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之说。如裴绪以五行八卦来推演八阵,赵本学在《裴绪演孙武子八阵辩》说其为“儿童之戏,巫觋之妖”<sup>[7]</sup>。

由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同辽和西夏的长期战争刺激了北宋朝廷对阵法的研究和创制,北宋一朝对阵法的研究、讨论、演习、运用从未中断。而在诸多阵法中,八阵法从太宗朝开始,长期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太宗给赵延进“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后来因为实战地形的限制而被迫改为两阵<sup>[8]</sup>。仁宗对于八阵法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仁宗将八阵法定名为方阵、圆阵、牡阵、牝阵、冲方阵、车轮阵、雁行阵、浮沮阵。所以从名称上看,它指的是8种阵形。从军队排布上看,它分为中军、左虞侯军、右虞侯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据仁宗朝官方编纂的军事类书《武经总要》的记载可知,仁宗亲自主持阵法的研究和修订工作,甚至亲自主持修订工作,由于没有任何战场经验,这次的修订水平较低,后世对此评价为“仁宗为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长。公亮等亦但襄赞太平,未娴将略。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大抵所谓检谱角觚也”<sup>[9]</sup>。

## 二、神宗朝对八阵法的建设

神宗即位后,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外,对于北宋的军事建设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军事战略方面,神宗摒弃了自太宗以来北宋在军事上长期执行的防御为主的国防战略,通过开熙河、修筑堡寨等措施,保持对西夏的进攻态势。在军事革新方面,神宗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加强军队的训练和考核,裁汰冗兵,整编禁军、乡军,设立将兵法、保甲制等。在武器的创制和生产方面,神宗加强武器研制工作,

创制了神臂弓等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新式武器,同时加强了对武器装备生产的管理力度。权御史中丞邓綰对此评论道:“伏以陛下之驭外敌,势与祖宗不同,真宗、仁宗意在无为,一用至柔,凡外敌慢侮请求,无不可忍。今自陛下临御,讲修政事,张皇威武”<sup>[10]</sup>。神宗就军事战略、制度和装备等多层面推行的改革,使得这一时期的军事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将从中御”的祖宗之法又让包括阵法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效果受到了限制。

神宗朝的阵法建设主要是以唐代李靖兵法为蓝本,对八阵法进行了一系列修订并将之付诸于训练和实战之中。为此,神宗从改革阵法中基本的战斗队形入手,推行李靖结队法。《宋史·兵志》说:“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sup>[8]</sup>。军队平时的编制与战时不同,战时要求把较为分散的部队和个人,结成统一的战斗集体,一般需要在平时编队的基础之上重新部署,而且无论是行军结营还是布阵作战都要以队为单位来布置,而各军的战斗实力的计量以及部队的训练装备,也多以队为基本单位。在进行结队时,士兵要找与自己相互了解、配合默契的士兵,这样才能保证军队纪律性,提高战斗力。神宗“患诸将军行无行阵之法”,而要进行革新。在推行结队法的过程中,神宗与群臣多次讨论,最终以李靖结队法为准<sup>[8]</sup>。熙宁六年(1073)五月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九人为一中队,赏罚候成序日取裁。其队伍及器甲之数,依泾源路牙教法”<sup>[10]</sup>。十二月乙亥,神宗谓辅臣曰:“李靖团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为队,已令李浩试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sup>[10]</sup>。由此可见,李靖结队法已进入实验阶段,但王安石等仍对之怀疑,王安石曰:“三代至于汉、魏,皆以五人为伍,至于三人,若一人战死,押官执刀在后,即斩二人,恐不可。然此法亦可增损为用”<sup>[10]</sup>。十二月庚辰,神宗就李靖结队法与王安石等大臣进行讨论,神宗“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又诏中书、密院同议之”。王安石仍以为不可。然而神宗极力推崇李靖结队法,争执不下,王安石建议“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队,相搏执以观其孰胜,其可用与不立见矣”。神宗于是命令郭固与殿前司各为一法,进行比较<sup>[10]</sup>。熙宁七年(1074),神宗又命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五结队法,六月“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法者,陈所见以闻”,最终在十月“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

遣近侍李宪付鄜延路赵高,俾讲求,推及诸路”<sup>[10]</sup>。熙宁九年(1076),神宗又将结队法推广于保甲。

神宗对李靖的结队法如此看重,甚至力排众议进行推广,这反映了神宗对李靖的军事理论高度认可,作为李靖兵法中重要内容的八阵法也自然受到了神宗的瞩目。神宗将李靖兵法视为圭臬,对八阵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赵高上奏恳请皇帝下诏,请博学多才之人研究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且将研究成果传授给边关将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这套阵法。神宗下诏让赵高和武将郭逵两人进行研究,制定相应的阵图上报朝廷<sup>[10]</sup>。五年后,赵高向神宗上奏称,因为八阵法失传已经很久,他们进行阵图创制的工作失败了。看到臣下只是围绕诸葛亮、李荃等人的阵法做文章,并没有关注到李靖兵法,神宗提出应以李靖兵法为蓝本进行演练。为此,熙宁八年(1075),神宗下诏整理李靖兵法,诏示枢密院:“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命令检正中书刑房王震等人对李靖的兵书进行校对和研究,并按类分别进行解释。神宗又下令让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在校对和研究李靖兵法的同时,和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等武将一起选择殿前司马军2800人实地教习李靖阵法<sup>[10]</sup>。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实际效果不尽人意,神宗对此极为不满,说“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牴牾,难为施用”,“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sup>[10]</sup>。此后,神宗坚持研究八阵法,多次召集大臣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借助在历史上屡创奇功的八阵法帮助北宋战胜西夏等外敌。

神宗对八阵法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八阵法具体形制进行讨论,二是将阵法落实到以实战为目的战术演练中去。就八阵法具体形制,神宗认为“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他认为所谓九军阵即“方以八包一”,是在中央军阵的四周排布八个军阵<sup>[10]</sup>。沈括与神宗的看法一致,他从数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算术;方物八裹一……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即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sup>[11]</sup>。元丰四年修撰完成的《李卫公问对》记载神宗朝八阵法之概貌:神宗朝的八阵法即九军阵,八阵指的是四奇阵、四正阵,加

上中军阵,共计九军,故而神宗朝的八阵法也叫九军阵法。这一阵法的形制是在古代五军阵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五军阵即前后左中右五阵。中阵为将领的指挥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机动部队。前后左右即战斗部队的位置,称之为阵地或实地。战斗部队之间的间隙地带,称之为闲地或虚地。利用实地进行战斗的部队称为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为奇兵。作战时,四正与四奇之兵与敌交锋,大将居中指指挥,并以“余奇”之兵策应重要作战方向。根据战场的情况,奇正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四块实地的正兵如利用虚地实施机动,即变为奇兵,反之亦然。在确定了八阵法的基本形制后,神宗积极推动八阵法的具体演练。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录,宋神宗曾令六宅使郭固演练九军阵,郭固在八阵队列排布上“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焉一巷,令面相向而立”。针对郭固的安排,沈括质疑道“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沈括主张“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在九阵的排布过程中,应当以阵为单位,而非以单兵为单位进行。郭固在八阵整体的排布上,使九军为一个营阵,沈括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三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之人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糜军也”<sup>[11]</sup>。神宗对郭固的阵法评价:“譬如此五指,若共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沈括主张布阵要有必要的分散,把九军作分散配置,让他们各自为阵,各占地利,即“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跃沟涧、林薄,不妨各自为营……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八阵法中四奇四正的变化要靠阵与阵之间的分离、组合实现,所以分合实为八阵战术运用的要旨所在。因此,神宗和沈括对于八阵的理解是正确的<sup>[10]</sup>。

这次演练最终帮助神宗确定了八阵法。熙宁八年(1075)八月“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sup>[10]</sup>。元丰四年(1081),神宗“以九军法一军营阵按阅于城南好草陂”,结果非常成功,并对于参与演练的将士进行了嘉奖<sup>[10]</sup>。这一年神宗朝对李靖兵法的校订

也有了最终的结果,宋神宗将王震等人用7年时间校对、编撰的《李卫公问对》和《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著名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并作为军人的武学必修教材。此后,经过多年的训练,北宋禁军对于九军营阵“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业、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sup>[10]</sup>。

神宗对八阵法的创制演练如此重视,那八阵法的实战效果又如何。据记载,北宋军队在实战中使用过八阵法,如在元丰三年(1080),都大经制泸州蛮贼事韩存宝在讨伐“泸州蛮贼”的时候就是将15 000名士兵,按照九军阵法分隶行营四将率领。神宗对此极为重视,还对行营四将的人选亲自进行安排。再如元丰六年(1083),皇城使、昭州刺史和斌征讨抚水蛮罗世念时“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策先锋阵将士皆力战。蛮人大败”<sup>[10]</sup>。从两次记载可以看到,八阵法确实在实战中得到使用,并且在部分战争中取得了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问题。对于韩存宝依九军阵法,九军置四将。《续武经总要》认为“盖黄帝孔明之阵,四奇四正,并中军而为九,大将之得四之一,八阵之众得四之三,谓之握奇,开阖出入,千变万化,其道无穷,何形势之有。神宗为九军似矣。惜乎中外无等,奇正不分,泥于形势。知九军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阵军七,故将亦七。九军而置四将,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无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sup>[12]</sup>。由此可以看出,神宗朝的八阵法虽依照李靖兵法中八阵九军,但只是取了一个形式上的相似而已。八阵法的核心是八阵分为奇正,根据实际的作战情况和作战地形,四奇四正灵活转化,以充分发挥战斗部队和机动部队的战斗力。这就要求八阵的每个战斗单元都要各司其职,分离开来各自具备独立的作战能力,组合起来又能达到战斗力极强的实战效果,这需要将领相机进行指挥调动。然而,神宗的八阵虽有九军却只安排4个将领,难以发挥八阵法奇正相辅的作用,失去了阵法本身的精妙,形似而实则相差万里。由此看来,韩存宝简单照搬八阵法,最终落得战败被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八阵法,神宗推广的四御阵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四御阵是神宗对古代五军阵的变形,古代五军阵即前后左中右五阵,每阵有一个将帅统领,中央为主将的指挥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机动部队。这是经过历代军事实践证明了的有效对敌阵法,后世的八

阵法也都是在五军阵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神宗不顾及此,命令“诸路并权住教五军阵,只教四御阵”。宋神宗所谓的四御阵,只是取消原来五军阵中居中部队,结果造成了“队为四部,将居中有亲兵而无部”。这样有致命缺点的阵法连文臣王安石都认为不妥,“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为变。不知四部分,则大将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则一部有两大将;若不附四部中,大将反无以自卫,如何待敌”<sup>[10]</sup>,分析可谓一阵见血。所以,尽管神宗极力希望通过研究、创制阵法以加强北宋的军事实力,但他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也缺乏足够的军事研究,因此出现九军置四将和四御阵这样的错误实属必然。

不仅是神宗皇帝,北宋一朝的阵法建设大都以皇帝为主导。宋太宗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的前提下创制了带有防御特点的平戎万全阵。真宗继承之并创制常阵。仁宗朝,阵图成为朝野上下共同关注的话题,群臣制阵图、上阵图蔚然成风,在仁宗的支持倡导下定八阵之法。及至锐意革新的神宗亦是孜孜不倦于阵法建设。然而这些以皇帝为主导的阵法建设都效果欠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皇帝除太祖外,大都是长居深宫、不娴将略之辈。他们创制阵法、阵图大都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缺乏战争的实践和检验。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排兵布阵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即使再精妙的阵法,如果不能机动灵活的使用,而是简单照搬书本上的兵法原则布阵,或以一定之阵形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无疑都是自缚手脚的愚蠢做法。

### 三、神宗朝的阵图及作用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神宗对于阵法的关注让朝野上下都对阵法与阵图的研究和创制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各种阵图大量涌现。如狄青之子狄谿上归仁铺战阵二图。元丰六年,单州团练副使、员外郎东方戒上飞虎立成图。连王韶、杨文广这样的名将也不能免俗,纷纷向神宗呈上自己创制的阵图<sup>[6]</sup>。不仅武将创制阵图,文臣也加入创制阵图的行列,其中一些甚至“大胆”将自己创造的阵图应用于实战中。熙宁初,知庆州李复圭要求李信等偏将率兵三千进攻西夏。李信深知宋军与西夏军队在数量和能力上

差距巨大,寡不敌众,所以告诉李复圭此事不可行。但李复圭“咸以节制,亲画阵图授之”。结果,虽有李知州所谓的“阵图”为指导,但宋军还是大败。李复圭急忙收回自己的“阵图”,并立即处死李信以推卸责任<sup>[10]</sup>。文官创制阵图虽始于仁宗,但在锐意进取的神宗时期并未绝迹,可见文臣管军的传统影响之深。

御授阵图是太宗开创的军事指挥方法,也是北宋“将从中御”的祖宗之法重要形式,神宗也坚持这一政策,如熙宁五年(1072),神宗曾赐予王韶御制的攻守图。熙宁七年(1074),神宗再次御制攻守图二十五部赐给河北前线使用<sup>[10]</sup>。虽然神宗依旧沿袭以往御赐阵图的传统,但也应看到神宗对于前线将官的管控不再沿袭太宗以后对于每个指挥官都安排阵图、监军一类“将从中御”的控制手法,而是给予他信任的将帅以充分的自主权。如王韶开熙河时,神宗付于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因此王韶才能屡创奇功,克敌制胜,取得一系列的胜利。神宗也曾手诏李宪“然阃外之事,朝廷属在将帅,趋利避害,固难居中预度,惟尔临敌自图择之”<sup>[10]</sup>。由此可见,神宗也很清楚在战争中给予将帅自主权的重要性。但对于神宗而言,虽然取得战争的胜利很重要,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放松了对武将的防范和牵制。神宗虽不以阵图节制诸将,但在大的战役中,仍然采取深宫遥控指挥的传统方法,如元丰四年至七年的泾原秦凤等五路伐夏之战中,五路分设一个统帅指挥,但不设置总指挥,这个总指挥的“重任”实际上是由远在皇宫内的神宗担任。他“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叮咛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之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济,人不敢不尽力,如李宪、张诚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弛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名,而莫敢肆”<sup>[10]</sup>。神宗为何会有如此前后不一的行为?这可以从他和王安石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解释。神宗与王安石谈论太宗朝用兵时提出太宗“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王安石则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太宗对于武将群体的不信任。神宗辩解道“祖宗时从中御将,盖以五代时士卒外附而内散,故惩其事而从中御”<sup>[10]</sup>。可见在神宗心中,将从中御、崇文抑武仍是对待武将群体的主要原则。

除了神宗心中牢固的崇文抑武思想外,文臣也

不断提醒神宗要恪守祖宗家法,防范武将。苏轼就曾对《孙子兵法》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赏爵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sup>[13]</sup>。这种奇谈怪论,连与苏轼一起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也不赞同,直接嘲笑“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阵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再生”<sup>[10]</sup>。

在这样的环境下,武将们即便被赋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也依然如履薄冰。没有哪个统军将官愿意有监军阵图之类掣肘,但王韶开熙河之前却主动上奏请李宪监军,对此王安石洞如观火,指出“韶无他,欲李宪在军中保证其所为以抗异论”。由此可见,不单神宗、文臣坚持崇文抑武的方针,连武将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祖宗家法的监管之下以求自保。虽然神宗推行了一系列涉及各个方面的军事改革措施,但依旧不能改变北宋军事“积弱”的现状。对此,章焘评说:“神宗皇帝挺英武之姿,有并吞西夏之志……尝兴师深入矣,乃无尺寸之功,尝拓地进垒矣,或有覆军亡将之辱”<sup>[10]</sup>。随着永乐之役的失败,北宋想通过五路伐夏最终消灭西夏的愿望宣告破灭,对此投入大量精力并寄予巨大希望的神宗在失望中病逝。

## 四、结 语

通过对神宗时期阵法建设和阵图使用情况和影响的梳理,可以清楚看到神宗锐意改革军事的精神。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朝野上下掀起对阵法讨论的热潮,但未能使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究其原因,首先,阵法应该是在长期实战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对地形、装备等因素综合考量而创制的,具体到每场战争,每次使用的阵法都要因地制宜,适时变通。神宗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经战阵,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在他推动下演练的阵法虽有其形却失去精

义,无法制敌取胜。其次,神宗虽因改革强兵的愿望而基本不以阵图节制将领。由于祖宗家法的影响,神宗还是紧抓军权不放,神宗一次次地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可谓“一兵之藉,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sup>[14]</sup>,北宋军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再次,神宗对于武将不信任,由文官出任边防将帅甚至御制阵图遥控指挥,是北宋皇帝“将从中御”防范武将政策的延续<sup>[15]</sup>。而满朝上下对阵法、阵图的研究、创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崇文抑武方略对于本应由武将担纲创制阵法、阵图这一具体军事操作层面的影响<sup>[16]</sup>。

#### 参考文献:

- [ 1 ] 吴晗. 阵图与宋辽战争[J]. 新建设,1959(4):87-95.
- [ 2 ] 陈峰. “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J]. 历史研究,2006(6):180-184.
- [ 3 ] 周荣,朱利民. 北宋仁宗时期的阵与阵图[J]. 唐都学刊,2010(5):103-107.
- [ 4 ] 陈峰,王路平.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J]. 文史哲,2006(6):119-125.
- [ 5 ] 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 6 ]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 7 ] 赵本学,俞大猷. 续武经总要[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 8 ]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 9 ] 曾公亮. 武经总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 10 ]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 11 ] 沈括. 梦溪笔谈[M]. 上海:上海书店,2003.
- [ 12 ] 李靖. 李卫公问对[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 13 ] 苏轼. 苏轼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 14 ] 叶适. 水心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 15 ] 陈峰. 北宋武将群体及相关问题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 16 ] 陈峰. 宋代军政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Eight-diagram tactics and zhenfa in SONG Shen-zong period

WANG Lu-ping

(The Monument of Xi'an Off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Xi'an 71000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Song was subjected to the menace of northern nomadic nations, that is, the Liao and the Western Xia for a long time. The wars with the Liao and the Western Xia stimulated the Northern Song to develop and formulate zhenfa (a historic military strategy). From SONG Tai-zong to SONG Shen-zong, it was never interrupted to develop, discuss, practise and apply zhenfa.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NG Shen-zong, zhenfa had a new development under his charge and promoti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s b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nfa did not improve the military abilit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Shen-zong; eight-diagram tactics; zhenfa; Liao; Western Xia

